

# 试论当代菲律宾国内的三种政治形态

彭 慧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菲律宾; 庇护; 部族; 民众运动

[摘要] 菲律宾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一是传统庇护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相结合的政治庇护制, 内部为垂直的金字塔式联结结构, 主导其国内政治主流。二是南部以亲缘关系、地域分隔为基础的部族政治, 其内部的分裂特质使其在与中央政治庇护制度碰撞结合时, 极易诱发部族或家族间的大规模政治仇杀, 2009年 11月举世震惊的菲律宾政治大屠杀即为明证。三是以水平方向联结为特征的大规模民众政治运动, 如三次“人民力量”运动及各种民众组织, 由垂直政治庇护网络内部张力而致。分析这三种政治形态间的关系, 可更加深入了解菲律宾国内政治全貌。

[中图分类号] D7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6-0011-06

## Three Kinds of Political Form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Peng 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Keywords** the Philippines; Patronage System; Clan; Mass Movement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o a modern state, three special political forms were completed in the Philippines. Firstly, the political patronage system, which combined the traditional patronage system and the modern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has a vertical structure like pyramid and leads the mainstream of the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Second is the clan-based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Its internal division is easy to induce large-scale political killings inter-clan or family when it collides with the central political patronage system. The political massacre in November 2009 is good evidence. The third one is the large-scale mass movements like the EDSA movemen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horizontal links. Analyses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political form and their relations may provide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在亚洲国家中, 菲律宾的政治体制是非常特殊的。自美国殖民后期开始, 菲律宾建立了与美国政党政治类似的选举制度。但在这表层的民主制度下, 掩藏的却是等级性的庇护制, 或恩主——侍从制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菲律宾人将本土的传统庇护制与现代民主制相结合, 构建了从政权中心至边缘的垂直性政治网络, 这是当代菲律宾国内最主要的政治形态。然而, 除去这种纵向性的政

治连接方式外, 亦有两种非纵向的政治形态影响着其国内政治, 一即南部穆斯林地区政治, 这是一种区域、血缘性的部族政治形态, 二即以水平连接方式为主的下层民众民主运动, 打破了纵向庇护链条。这两种政治形态, 分别从地域上和垂直网络的内部打破了垂直庇护制。讨论这三种政治形态的作用及其互动, 可能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当下菲律宾国内政治发展态势。

\* [收稿日期] 2010-04-19

[作者简介] 彭慧,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一 菲律宾存在的三种政治形态

根据詹姆斯·斯科特的经典阐释, 社会学家一般会用三种模式解读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合作与冲突形态, 一即垂直式庇护联系方式, 是以恩主——侍从间互惠关系为基础, 逐次形成的“金字塔”式政治模式; 二是以原初性的族群、语言、宗教及地域性关系为纽带, 形成的“块状”的群体及其之间的关系; 三即水平方向的阶层组织方式, 以相同经济地位的阶层组织反对上层的运动为主要模式<sup>[1]</sup>。这三种模式, 在解释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形势时, 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但在菲律宾国内, 这三种模式的政治关系却同时存在, 并对其国内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 在菲律宾, 庇护制有悠长的发展历程, 并经历了从传统道义庇护向现代政治庇护的转变。所谓庇护制, 按照经典的概念, 即为: 一种角色间的交换关系——可以定义为包含了工具性友谊的特殊双边联系, 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资源为地位较低者(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及恩惠, 而被保护者则回报以一般性支持和服侍<sup>[2]</sup>。殖民前的菲律宾, 属于封建制与奴隶制混合形态, 在巴朗盖社会基础上, 形成的是以效忠、服务拿督(Datu)个人为核心的主人——依附民关系。这是从血缘关系发展而来、非常分散的原初庇护制。在这种庇护关系下, 为了保证共同体的经济生存与血统延续, 庇护双方的经济与道义依赖程度较大, 侍从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群体内的重大事件也均由成员共同协商决定。西班牙人来到之后, 巴朗盖社会被整合进殖民体系中, 原先的酋长与首领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首脑(Principala), 成为殖民政权与下层农民间的中间层, 即庇护“掮客”。这一阶层对上侍从者, 他们遵从西班牙人的统治, 为其提供资源并保障地方安定。对下则利用殖民统治者所赋予的政治特权, 改变原先庇护双方的权力均衡, 开始大肆劫掠土地等财富, 成为特殊的权贵家族。其对侍从的道义责任也相应减少, 侍从的弱势状况开始加剧。美国殖民者接手菲律宾后, 开始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引进本地, 菲律宾的传统庇护制开始向现代选举庇护关

系转变。然而最初, 美国人依赖当地上层治理菲律宾本土, 将民主门槛设定得非常高。根据 1901 年的市政法令, 选举权只被赋予通晓英语或西班牙语、担任市政职位以及最少拥有 250 美元财产或者每年交纳 15 美元税收的男性<sup>[3]</sup>。从当时菲律宾的经济水平来看, 这种选举只被限制在原先的上层家族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 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均是出自一个阶层, 因此, 正如威廉·沃特所说, “只需要依赖(上层的)庇护、自身的名望, 以及家族亲属的支持, 地主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市长或省长的位置。”<sup>[4]</sup>由此, 民主制的引进, 使得原先的上层恩主利用优势一跃真正成为“政治家族”。

二战后, 随着菲律宾的独立, 其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政治条件上, 选举的限制性条件越来越少, 大众参与民主成为可能。但是, 政治权贵仍把持着权力, 他们将原先以土地为核心的传统庇护制转化为以国家资源分配为核心的选举庇护制, 在全国建立起层层的政治庇护网络。至此, 菲律宾特色的选举庇护制开始正式形成。它与传统道义庇护及西方选举庇护都不同, 与传统庇护制相比, 其特点在于: 原先恩主所掌控的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其上任后所能操纵的资金、机会与提供的官职, 而原先侍从所提供的土地收成、服务及忠诚, 也被选票所取代。由于传统庇护关系下的地方道义责任的消失, 这种庇护制的工具性更加突出, 恩主与侍从间的关系也更加不稳定。与西方的选举庇护政治相比, 这种制度显得更加随意、更无规则。由于菲律宾政治由大家族掌控, 被选举人与选民间的权力砝码明显倒向被选举人一方, 选举过程中使用政治威胁、讹诈甚至作弊是惯常手段。美国学者詹尼弗·福兰科就将这种特殊的政治庇护制称为侍从选举体制(Clien telist Electoral Regime), 这是“一种特殊的、无程序的、无内涵的系统”<sup>[5]</sup>。

此后, 菲律宾选举政治, 又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马科斯独裁与重新民主化的过程, 选举政治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sup>①</sup>, 但即便如此, 以家庭统治为核心、庇护关系为特征的政治网络仍是主导性的政治组织形式。

其次, 在菲律宾国内, 除上述以垂直庇护为特

① 有些学者曾断言, 由于选举庇护制度需要大量的国家资源以满足下层侍从的需要, 因此最终会造成可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 国家不得不进行“赤字财政”, 即所谓“民主膨胀”, 因而全国性的选举庇护制度已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破产, 这也是马科斯实施军事管制并大借外债的重要原因。

征的政治庇护制度外, 另有以部族、语言文化群体为组织方式的政治区域, 即为山民群体与穆斯林群体。这两大群体长期游离于中心庇护政治之外, 而后一群体却对其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 14 世纪西班牙人尚未来到之前, 菲律宾穆斯林群体便在其聚居的南部棉兰老岛上建立了数个部族伊斯兰教国。这些在原先巴朗盖社会基础上建立的部族国家, 内部实行自上而下“苏丹(或拿督)一自由农一奴隶”式的庇护制, 外部不同部族间的语言和地域罅隙也非常明显。菲律宾北部“他加禄人”、“宿务人”这种本地化的忠诚, 在西班牙人集权统治的影响下逐渐淡化<sup>[6]</sup>, 但由于长期成功抵制了西班牙人与美国人的入侵, 南部地区地域性的部族意识却一直有着极强的控制与指示作用。群体下总共 13 个部族, 形成时期虽然有早有晚, 但基本都以居民聚居地的名称或特征来命名。在最大的三个部族中, 陶苏格人意为“河流之民族”<sup>[7]</sup>, 马拉瑙人则是“拉瑙湖的人民”。这些部族, 语言各不相同, 环绕在其祖居地附近, 以地方首领为核心, 簇族而居。菲律宾建国后, 由于南部地区的特殊性, 以及南部长期的反政府武装运动, 马尼拉政府一直没有将其完全纳入政治统治之内。从 1996 年建立至今的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 (ARMM), 也是依靠地方部族首领才得以实现脆弱统治。在南部这种社会体制下, 形成的是以语言文化部族为单位、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庇护系统。

与菲律宾中北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庇护网络相比, 南部这种庇护系统的特征在于其内部显著的部族性及由此带来的分裂性。(1) 在部族内部, 由于地方村社系统与亲属互助制度一直是有效的群体生存、延续手段, 而且恩主常为部族或宗教首领, 恩主与侍从间依赖关系很深, 群体的组织动员能力相应便很强。Thom as Kiefer 在对南部各部族作了长期观察后, 认为亲属关系可以渗透到其生活的诸方面, 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动员。因此, 在战后菲律宾, 家族统治在南部根深蒂固, 且牢牢控制地方政治。据统计, 在全菲律宾 250 个政治家族中, 大部分都存在于南部。(2) 村社系统之上, 以部族为单位的社会单位间分裂很明显。“部落民族团体的本质就是它在通常情况下‘不是政治组织, 而是社会—文化—民族团体’, 对于这些部落民族来说, 四分五裂和相互产生敌意是常有的事情

……”<sup>[8]</sup>在菲律宾南部, 部族间因争夺资源而致的家族仇杀与报复(当地人称之为 Rido) 最为盛行。据调查, 从 1930 年至 2005 年, 南部共发生了家族仇杀报复事件 1266 次, 共导致 5500 人死亡<sup>[9]</sup>。应该说, 家族间矛盾与仇怨在北部也屡见不鲜, 但南部的家族仇杀却是常与部族矛盾互相交织, 情况更为复杂。

由此, 南部地区的特殊庇护系统, 一方面加强了部族内部的团结, 另一方面却易诱发部族间的仇杀。这种与中北部地区不甚相同的地方制度, 在与北方选举庇护政治相交接时, 必然产生碰撞, 对此下文将在有关章节作详细解读。

最后, 与垂直庇护网络及南部特殊庇护系统所不同的, 是以水平联系为标志的下层民众要求平等与民主的运动。20 世纪的菲律宾, 各种各样的民众运动可谓接连不断。从 30 年代起, 就建立了要求分配土地、改变等级制的胡克运动。而菲律宾独立后的群众运动, 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正规组织, 并有长远政治目标的群众组织。如 1985 年成立的新爱国联盟 (BAYAN), 是联结了多个派别的政治联盟。其下的加盟组织包括“五一劳工运动” (KMU)、“农民组织” (KMP)、“妇女组织” (GABRIELA)、“移民组织” (MIGRANTE) 等, 甚至还包括政党组织“人民优先” (Bayan Muna)<sup>[10]</sup>。另一类则是以三次“人民力量” (EDSA) 为代表的短期群众联盟运动。这三次运动爆发迅速, 能量巨大, 曾推翻过腐败的马科斯与埃斯特拉达政权。

为什么在庇护关系的层层垂直建构下, 仍会发生水平方向的群众运动呢? 原因在于, 庇护制度所形成的金字塔式网络, 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与矛盾, 它虽然暂时可能通过利益的向下渗透整合社会各阶层, 但其稳定作用也是有限的。一方面, 就大的经济环境而言, 在全国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时, 资源总量较大, 可用于分配的利益也相应较多, 此时的庇护网络就相对比较稳定。但一旦总体经济发展陷于困境时, 恩主能用于向下分配的利益自然会减少, 侍从便可能求诸其他手段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 庇护制度本身就是等级制的另一代称, 在恩主可以通过谋取政治官职、通过强制手段来加强自身地位时, 最下层的侍从地位必然越来越低下, 其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最少, 在适当的条件下, 群众运动就可能发生。而且, 如上所述, 战后

建立的工具性庇护制, 双方的庇护关系非常脆弱, 下层很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改变自身的处境。

那么, 以上所述的三种政治形态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并对当代菲律宾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呢? 下文将具体讨论。

## 二 菲律宾三种政治形态的关系

由于选举政治的主导性地位, 讨论菲律宾三种政治形态的关系, 关键在于分析选举庇护制对后两者的促进与影响。

首先, 对菲律宾中北部的选举政治与南部部族政治间的关系, 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 从 20 世纪初开始, 直到 70 年代, 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接触期。在菲律宾独立前, 美国为了改造南部, 也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南部地区统合到菲律宾的全国选举体制中。而处于部族分治下的穆斯林群体, 对此反应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精英, 以北部精英为效仿对象, 开始接触甚至利用民主选举的机会, 为本家族、部族谋取利益。例如 20 至 40 年代, 一批穆斯林精英入选政府宪法制定大会, 他们以大会为媒介, 向政府表达政治、经济平等权的要求。此外, 穆斯林青年协会、“和乐之子”协会、哥达马都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等青年组织纷纷建立。然而, 南部部族情况复杂多变, 除这一小批穆斯林精英外, 大部分南部穆斯林群体对北部的选举制度都持排斥态度, 拒绝参加统一选举。南部仍处于部族分立的分散状态, 选举庇护制并未深入影响部族政治。

20 世纪 60 年代后, 以密苏阿里和萨拉马特为代表的“非传统精英”崛起, 他们试图整合南部十几个穆斯林部落, 挑战北部天主教徒政府的统治。而马科斯总统也利用动乱, 转移其统治危机, 于 1972 年宣布进入军管统治, 至此, 南部进入混乱状态, 南北部政治体制间的互动暂时被打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 南部统一的分离运动陷入低谷, 局势逐渐安定。而 1986 年, 马科斯独裁统治被推翻, 菲律宾开始重建选举制, 两种体系间也开始了新的整合过程, 即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 由于密苏阿里的分离运动并不能将各部族统合起来建立所谓的“摩洛民族”, 地方政治仍由各部族首领所把持。而且, 几十年大规模的分离运动还加强了穆斯林对地方首领的依赖。在南部混乱局势下, 各部族穆斯林不得不依赖地方首

领的军事保护与经济援助, 地方领袖集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于一身, 俨然成为地方军阀。不同部族势力间常为争夺资源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 马尼拉上层不可能撇开部族首领, 实现对南部的有效控制。对南部实施分而治之, 选取部分部族领袖作为政治侍从, 成为马尼拉政府的最佳统治方法。而且, 拉拢部分政治家族从而排挤另一些穆斯林上层, 还可以造成部族首领内讧, 进一步分化南部不同势力, 从而避免了统一的分离运动的动员。

而对南部地方首领来说, 经历了几十年无结果的分离运动后, 他们审时度势, 开始以各种方法融入中央政治体制中, 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实, 即便是一度提倡分离运动的密苏阿里, 也不过是部族政治的代表。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眼看大势已去, 便承诺放弃分离, 换取合法政治身份, 开始融入中央庇护制中, 并与各任总统讨价还价。马科斯统治后期, 他甚至以其旗下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工具, 与拉瑙地区的首领阿里·蒂马波罗争夺权势, 试图在中央权力中分一杯羹。1987 年, 南部各省公投成立了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 由棉兰老四省组成, 密苏阿里任主席, 这都是以下放权力与地方自治为基础的, 而且马尼拉政府对自治区投入了大量财力。在这种情况下, 赢得上层庇护、夺取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的权力, 便成为南部各方势力的主要政治目标。

因此, 在这些地方, 菲律宾的选举庇护制与部族政治相结合, “选举”成了部族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这样, 以部分上层精英为中介, 中央庇护系统与南部地方政治网络以这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

这种政治联结方式, 与菲律宾其他地区庇护制的相同之处, 在于政治恩主与侍从间的互惠本质及选举的形式化, 但其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不稳定性与易变性。由于上层恩主只在为数甚多的地方部族领袖中选取少数作为侍从, 必定引起穆斯林上层内讧。而且随着上层政治恩主的变动, 下层穆斯林精英侍从也必然被更换, 频繁变换的庇护体系会引发地方政治动乱。有学者做过统计, 从时间上看, 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间, 家族间大规模仇杀的频度都非常低。60 年代, 政治选举制度开始正式融入南部, 政治性的仇杀开始。到 70 年代末后, 仇杀的频率开始不断增大。进入 90 年代后, 为夺取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的职权, 家族争斗更加

激烈,手段也更加暴力。比如,安帕图安家族在阿罗约的庇护下,长期攫取了位于自治区的马京达瑙省大部分的官职与权力,受到其他家族的觊觎与抗议,政治家族间的矛盾长期积累,终于在2009年11月得以总爆发。为能仍在2010年新一轮选举中胜出,安帕图安不惜残忍杀害了竞争对手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的亲属、支持者50多人,制造了菲律宾选举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可谓举世震惊。而这正是两种政治形态联结、碰撞的结果。

其次,菲律宾的政治庇护制度对水平方向民众运动的促进与影响,大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马科斯独裁期间,这一时期的选举庇护制度正处于建立、动荡期,它促进了民众组织的发生发展。

伴随着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引进,从20世纪初开始,菲律宾就有了工人组织。1902年,菲律宾国内第一个工人组织“菲律宾民主劳工联合会”正式建立,它标志着菲律宾现代群众运动的开始。进入30年代后,特别是40至50年代,中北部开始从传统庇护制度向现代政治庇护制转变。原先的地方恩主利用高门槛的民主制度,转身变成了政治领袖,他们改变了传统庇护中的恩主与侍从间的平衡,加速了传统庇护制的破产。“如果他可以依赖外来的警察、法院或者军队来保证其对本地资源的控制,那么他便可以在本地毫不费力地使用强制手段(而不是依赖互惠性的庇护制)。”<sup>[11]</sup>因此,他们在乡村大肆掠夺土地等资源,加剧土地集中,农民的境遇越来越糟。这种转变使得下层侍从不得不联合起来,各地农民运动此起彼伏<sup>[12]</sup>。而此时菲律宾的大批工人也仍属于农业工人,他们大部分受雇于大地主的农场中,因此,地主势力的增强也使得工人地位下降,这样又造成了工人的联合<sup>[13]</sup>。因而在这期间,菲律宾劳工组织迅速成长。据统计,在1946年之前,菲律宾的工会组织成员只有约10万人左右,但在战后几年间,工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到354 000人,增长了三倍多<sup>[14]</sup>。

20世纪70至80年代马科斯统治时期,民众组织活动更加频繁。马科斯大搞家族政治,其势力深入到经济的各个部门,传统的地方庇护已被破坏,正在建立的政治庇护制也被打破,多个政治家族被其隔断在政治结构之外。特别是进入马科斯统治后期,菲律宾经济形势恶化,可用于渗透的利益

越来越少,更多阶层民众的利益受到威胁,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蓄势待发。

1970年1月,为抗议马科斯总统的舞弊选举,新组建的“新人民军”在马尼拉发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数千名工人、学生、教会人士聚集起来攻击总统府,这一年由于发生了一连串骚动后来被称为“第一季的风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更是风起云涌,1980年至1981年间,上万的城乡贫民多次走上街头,表达民意。一直到1987年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终将马科斯推下总统宝座。“那些在群体中才能发现自身力量与意义的菲律宾人,被‘人民力量’运动的群体精神所吸引”<sup>[15]</sup>,他们暂时摆脱了对“庇护垂直群体”的依赖,转而投向了“水平大众群体”。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涵盖众多阶层,以推翻现行体制,实现大众民主为目标。

马科斯下台后,选举政治与民众运动的关系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人民力量运动并没能带来真正民主,选举庇护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而民众运动的组织形态也开始多样化,试图利用现行体制、从体制内部建立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菲律宾国内重建的选举政治系统逐渐稳固起来,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为了粉饰民主,政治反对派被给予了一定空间,既得利益阶层——上层政治恩主开始多元化,选举庇护制内部张力稍有缓和。而原先的民众运动也渐渐开始分化,以“民族民主”运动为代表的旧式组织,由于执着于传统暴力路线而失去了支持;新的民主组织则纷纷建立,它们以融入体制、改变现状为目标,试图利用上层恩主的多元化,从不同政治恩主处直接获得资源,使农民摆脱地方恩主的束缚,从现行体制内部创立“人民民主”。在新的民主组织中,以“大众民主组织”、“社会主义思想行动前行联盟”以及前新人民军的领袖丹特创立的合作组织最为突出。“大众民主组织”在80年代中期开始独立活动,建立了广泛的群众联盟,他们提倡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合法的选举议会道路,参与精英政治,从内部改造其弊端,从而实现所倡导的“大众民主”。在下层群众中,他们建立了“大众民主研究所”以及“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两大机构,以切实改变菲律宾农村现状。而“社会主义思想行动前行联盟”则在比萨扬和宿务地区分别建立了“组织行动会”、“宿务劳工

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劳工参与选举，反对精英控制政治。丹特在塔拉克建立的合作组织成绩也颇为不俗。他组织了近万名农民参与小型信贷，传授先进耕作技术，建立集体市场机制。农民互相联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恩主的控制，其收入明显增加。这三大组织所辖范围不同，但都以“群众利益”、“参与式民主”以及“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为口号。这是一种建立“市民社会”，改变精英政治中侍从力量过于弱化的努力，即所谓“赋予人民力量”（Empowering People）<sup>[16]</sup>。

同时，这些合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开始参与选举政治。从1995年开始，民众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开始建立政党，其中 Akbayan ABA-AKO 以及 San lakas 等几大政党已在国会及地方政府中赢得了席位。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是下层的侍从阶层自我组织，挑战家族政治、恩主庇护制度的有效手段与途径。

除地方小规模互助和自救组织外，马尼拉地区的大规模反精英统治、要求民主的大众运动也接连发生。2001年，在新爱国联盟的组织下，马尼拉发动了第二次人民力量，成功地推翻了腐败的埃斯特拉达政权。2001年和2005年的两次群众示威活动甚至威胁到阿罗约政权的稳定。下层民众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身的不满。

因此，菲律宾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庇护制度建立的反应，也是政治庇护制度内部张力的体现，其与政治庇护制度的建立发展直接关联。

### 三 菲律宾的三种政治形态的现状与菲律宾局势

20世纪90年代后重建的精英选举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政局，促进了经济好转，但却是以长期牺牲下层利益为代价的，其内部矛盾必定越积越深，而且政治格局非常不稳定，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近20年间，几次“人民力量”运动之后上台的政府开始时总是呼声很高，最后却难免因腐败或不作为而下台，甚至一度被赞为“平民总统”的埃斯特拉达也被民众运动赶下台，换上了代表传统精英的阿罗约。然而，无论是平民总统还是传统精英，换汤不换药，菲律宾国内的精英政治已陷入了“起义—上台—腐败—下台”的怪圈。

因此，有西方媒体评论说，民众运动推翻政府已成为菲律宾人的坏习惯。孰不知在精英选举体制下，除自发联合起来、表达利益诉求外，菲律宾的下层民众并没有真正影响选举政治的能力，走上街头或联合自助成为其唯一选择。然而一次次的“人民力量”运动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菲律宾的政治庇护系统已是沉痾痼疾，积重难返，各派的精英仍是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2010年2月菲律宾国内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阿罗约政权的不信任度已达到了70%。但是，为了5月的全国和地方选举，阿罗约仍费尽心思，积极接受传媒访问，甚至还将其屈指可数的经济成就在报纸上广而告之<sup>[17]</sup>。连一度臭名昭著的埃斯特拉达也图谋卷土重来，参加2010年大选。这种滑稽的政治闹剧在菲律宾的选举政治下已是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解决也难有起色。各届政府都将穆斯林地区当作烫手山芋，无心真正解决南部部族政治问题。而依赖地方部族首领的政治合作，虽能保一时安定，长远却只能加重南部动乱。2010年3月9日，马尼拉政府已明确表示，阿罗约曾许诺任内实现南部和平的目标彻底失败<sup>[18]</sup>。由此，菲律宾的选举政治与南部部族政治间的碰撞仍会长久持续下去。

而上述的各种民众组织，在小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主导性的庇护制度影响有限。加上各组织利用现行体制，往往直接从更上层精英处获得资源，自身也难免落入恩主侍从互为关联的窠臼，极易为上层所利用。因此，各派别之间分歧颇大，它们在“人民力量”式全体动员的形势下有可能团结起来，但是当选举真正来到时，却会分道扬镳。在这几年间，各大组织几度试图在选举中联合起来，但却总是无果而终。

总而言之，菲律宾在向现代国家转变时，逐渐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三种政治形态。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精英控制、民主为壳的政治庇护制度，其与南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政治间形成了独特而脆弱的联结方式，使得南部局势更加复杂、多变。而这种垂直庇护制度内部的张力与冲突，使得水平方向联结起来的民众自助运动也成为政治常态。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局势在长时段内能否安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政治形态的发展及其互动。

（下转第36页）

越南在自我所属主权海域和岛屿的作用的决议》)。

[20]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VII* (《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1] 参考 *Nghi quy t so 03 NQ/TW cua Bo Chi tri ve mot so nhien vu phat trine kinh te trong nhung nam tuoc ma* (1993年6月05日越南政治局《关于近年发展海洋经济的任务的决议》)。

[22]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VIII* (《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3] 同 [22]。

[24] Dang Cong San Viet Nam, *Bao cao chinh tri cua Dang tai dai hoi dai bieu toan quo lan thu IX* (《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党代会文件》), NXB Su that

[25] *Bao cao chinh tri cua BCHTU Dang Khoa IX* (《越南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26] Ta Quang Ngoc, “Viet Nam som tro thanh mot quoc giam anh ve bien va giao len tu bien” (谢光玉:《为越南尽早成为海洋富国, 依海富国富国的国家而努力》), [http://www.tapchiconsan.org.vn/details.asp?Object=4&news\\_ID=17756362\\_17/07/2007](http://www.tapchiconsan.org.vn/details.asp?Object=4&news_ID=17756362_17/07/2007)

[27] 参见 *Nghi quy t so 027/2007 NQ - CP ng y 30/5/2007 cua Ch nh phu v` Chu` ng tr nh h nh` i Qig cua Ch nh phu thu`c hi n Nghi quy t s 04/06 nghi Trung u`ng V`n th` 4 kh a Xv` Chi n lu`c bi n Vi. t Nam 1`n n`m 2020* (越南颁发的《政府实施党第十届第四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的行动章程的决议》), [http://www.thuvienluc-at.com/chitiet.asp?id=23618\\_30/07/2009](http://www.thuvienluc-at.com/chitiet.asp?id=23618_30/07/2009)

【责任编辑: 吴宏娟】

(上接第16页)

【注 释】

[1]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2, Vol. 66, p. 91.

[2] 张立鹏:《庇护关系——一个社会政治的概念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3] Manuel Caoili “The Philippine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an, 1986, p. 30.

[4] Willem Wolters “Politics Patronage and Class Conflict in Central Luzon”, *New Day Publishers*, 1984, p. 187.

[5] Nathan Gilbert Quinpa “Oligarchic Patronalism, Bossism, Electoral Clientelism, and Contested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2005, pp. 232-235.

[6]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著,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上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371-372页。

[7] <http://class.csueastbay.edu/anthropologymuseum/virtmus/Philippines/Peoples/Tausug.htm>, Tausug People 2008-04-05.

[8] 同 [6], 第329页。

[9] Wilfredo Magno Torres III *Rido: clan feuding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indanao*, Makati City: The Asia Foundation, 2007, p. 16.

[10] 朱进佳:《简述菲律宾左翼的状况》, <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20/200910/110778.htm> 2009

- 10- 25.

[11] James Scott “The erosion of patron-client bonds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 1972, p. 12.

[12] Catherine Porter “Philippine Labor Policy in the Making”, *Far Eastern Survey*, Vol. 9, No. 8, 1940, p. 88.

[13] Catherine Porter *ibid.*, p. 4.

[14] Leo C. Stine “Philippine Labor Problems and Politics”,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8, No. 14, 1949, p. 164.

[15] Cristina Jayme Montiel and Victoria Marie Ching-bian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2, No. 4, 1991, p. 768.

[16] O. T. L. Riquist “Democratic ‘Empower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Radical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May 1992 Philippine Elec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93, p. 511.

[17] Distust high for Philippine president Arroyo survey <http://www.zimbardo.com/Philippine+Politics/articles/w-PgE2IJ1q/Distust+high+Philippine+president+Arroyo> 2010-02-24.

[18] Agence France-Presse, Philippines rules out Muslim peace accord under Arroyo <http://www.abs-cbnnews.com/nation/03/09/10/philippines-rules-out-muslim-peace-accord-under-arroyo> 2010-03-09.

【责任编辑: 吴金平】